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动的文化机理初探^{*}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活动的田野观察

刘 谦 冯 跃 生龙曲珍

【摘 要】 借助教育人类学视角,结合田野观察和问卷调查方法,针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动进行调研发现,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家校互动中,存在干预性教育行为、非干预性教育行为和情境性教育三种主要实践模式,在每种模式互动中,都彰显着人们对教育目标的理解、社会资本的限制、自我经历的复制等社会文化因素对教育实践的影响。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需要和其学校教育一起,共同受到社会和政府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文化

【作者简介】 刘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 100872);冯跃,首都师范大学社工系副教授 (北京 100089);生龙曲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 (北京 10087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日渐突出^[1]。目前国家正大力推出“两为主”方针,着力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问题。然而,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家庭教育的关注还十分有限。家庭运行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教育的特点。家庭被视为一个更偏重感性的生活世界,更加突出个体的需求,直接指向生命的自然状态。依此,家庭教育更偏重个体性、针对性和细致性,而学校作为专门传递知识与文化的社会设置,在教育活动中无疑有着专业性。“怀海特和门汉等人曾经提醒我们,教育机构总被用来培养和观察使观念不朽;但是它们可以使观念蒙上一层神秘性,使它们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或者甚至使它们成为木乃伊。”^[2]学校的教育活动在对象上,强调群体性;在评价上,强调针对教育对象群体形成的一套相对统一的标准性;在约束上,强调以明确

的制度性来规范教育对象的行为。怎样贯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使之相得益彰地作用于人的教化,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教育人类学是一门以文化的视角透视教育活动的学问,它秉承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整体观,强调应用田野工作方法,对人在教育中的形成、转变与发展给予细致描述和深入阐释。教育人类学启示我们通过深入的田野工作,关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所各自依存的文化生态系统,从人性塑造和文化习得的角度理解教育现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以农民工随迁子女为主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实证观察,揭示二者的互动机理与规律,从而为改善教育环境,形成合力,

^{*} 本文系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11D009003000002)的研究成果。

更好地培养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提出对策建议。研究采用教育人类学视角及其擅长的田野观察方法,结合一定数量的问卷调查,研究重点对象聚焦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同时,为便于对比,问卷调查还包括对市民家庭子女教育的调查。2010年5月至2011年1月,研究团队以支教、家庭辅导等方式,对北京城乡WJ、SB、ZH三所学校的10个不同类型的小学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田野观察,形成数万字的田野笔记。其中,来自农民工随迁子女的5个个案为来自ZH和SB两所学校的四年级学生:响亮、鹏鹰、小红、雪儿、小阳。在田野观察的基础上,课题组以对招收市民子女为主的学校WJ,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民办学校ZH学校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学生问卷225份(WJ学校101份,ZH学校124份),教师问卷81份(WJ学校48份,ZH学校33份),家长问卷201份(WJ学校100份,ZH学校101份)。在下文中,以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田野观察素材分析为主,在需要和市民子女进行对比时,引用WJ和ZH两校问卷数据。^①

二、主要发现

面对扑面而来的诸多家庭教育活动,我们将家庭教育实践分为干预性教育行为、非干预性教育行为和情境性教育行为。在从鲜活的田野素材中对以上三种家庭教育实践进行描述的同时,寻求这些家庭教育实践与学校教育实践、诉求之间的关联。

(一)强化与共生——干预性教育行为

这里的干预性教育行为是指家长为实现教育目的,对孩子言行进行明确、有意识地规范。它包括正向鼓励、支持和负向约束、惩戒。这类家庭教育实践,表现出和学校教育规范、诉求较强的一致倾向,特别是针对完成作业、学习习惯培养、荣誉感培养等。比如,在入户进行田野工作的ZH学

校所有学生家庭里,无论住房多么简陋、凌乱,都可以看到墙壁上张贴着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奖状上写着“奖励**同学在**学期考试中成绩优秀”、“授予**同学优秀学生干部”、“奖励**同学运动会表现突出”。张贴奖状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活动及其标准的认可,并将其纳入家庭环境的一部分,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家长通过惩戒,追寻着学校教育的规范与要求,如有这样的记录:

一年级,我那次……把拼音作业本弄湿了还是撕坏了,我忘了。然后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哭,我爸就生气了,拿皮带抽我,那次特别狠。后来,我再也不敢了。

(响亮,男,四年级,农民工子弟,ZH小学)

田野观察中发现,不仅在学习问题上,而且在道德品质问题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遵循着一致的原则。如ZH学校学生家长,大多数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班主任老师会在带领学生处理班级废品攒班费的过程中,特意教育学生“咱们卖就卖咱们自己的,不能拿别人的(废品)卖”。回到家里,尽管零花钱很少,响亮总是告诉我们“爸妈不让他要别人的钱”。

以上具有明显干预性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活动的着眼点和取向与学校教育的要求在本质上保持一致。正如费孝通指出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合力,无非为塑造一个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公民。^[3]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衔接,而且二者在教育活动的文化模式上也存在着共通。响亮爸爸用皮带抽打惩戒的方式,体现了一种直接的限制。而在响亮就读的ZH学校教育实践中也可以看到类似对行为的直接矫正,如有这样的记录:

S老师为了维持课堂秩序,更多付诸行动,她主动走下讲台三四次。其中有一次,没有预警地直奔教室左下角倒数第二排,打了坐在里边的男

^① 由于本调研涉及学生家庭生活及其所在学校具体教学环节,为保护研究对象个人信息和相关利益,文中采用匿名代号和化名方式,显示学生和校信息。这三所学校分别代表了三种类型的学校。WJ为区示范校,地处高校教师小区,以市民子女为主要招生对象;SB为公立小学,是城乡结合部的片区中心小学,以招收周边农民和农民工随迁子女为主;ZH为政府批准的民办小学,地处城乡结合部,绝大部分学生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少数部分为当地农民子女。

生,不知道是被拧的还是打的,总之他立马安静了,整个右胳膊垂着,好像僵住了。

(S老师,ZH学校,四年级班主任,35岁)

S老师对于违反纪律学生的矫正方式体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所在民办学校的文化模式与其家庭文化模式的一致性。

2. 失语与忽略——非干预性教育行为

失语与忽略状态的非干预性教育活动是指家庭教育对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言行、环境没有进行有意识的规范、改变,任其保持现状或发展下去。传统上,教育学者将教育描述性地定义为“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以凸显教育与作为人类社会独特活动存在的价值”^[4]。然而,依托家庭生活感性实践进行的家庭教育活动,在某些状况下,家长的“教育”意识并不明显,却对孩子产生深远影响。伴随着家长对日常生活的反省,这些曾经没有明显教育意识的活动,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会转换成家长有意识的教育活动。因此,为避免对于动态的家庭教育过于凝固的理解,需要将失语和忽略状态下的非干预性教育活动纳入视野。这样的理解与观察,体现了教育人类学对教育活动的全面理解,即凡是对人性的形成和转换能够施以影响的实践,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黑格尔说:“有,分为纯有和实有,前者实际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后者有着有限的有,并过渡到与自身的无限联系,过渡到自为之有”。^[5]正是在这一组无意识的非干预性教育行为与有意识的干预性教育行为的相对关系中,通过更好地把握有和无的界限与范围,才可以更好地领会家庭教育在总体上对于人的塑造的意义及其种种局限。

布迪厄也曾指出,大多数人类行为完全是以意图以外的东西为原则,他不需要有意识地知道他为了做而做的事情。他将惯习描述为位置的产物,是不同的和各有特色的实践的生成法则——工人吃的食物,尤其是他们吃的方式,他们进行的体育活动及其进行的方式。^[6]我们可以将非干预性家庭教育视为一种惯习,置于家庭文化体系内进行考虑。家庭文化是指一个家庭世代承续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家庭道德规范以及为人处世之道等。^[7]在家庭场域下,非干预性的家庭教育行为,

既深刻体现了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的实践特征,也深刻反映了家庭文化对于人的濡化意义。

本研究中的非干预性教育行为,又大致分两种情况:“视而不见”的非干预性教育行为和“不视而在”的非干预性教育行为。前者指由于家长个人经历、教育理念、所持有的社会资本所限,对于一些作为未来社会成员需要规训的方面没有给予重视和及时修正。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它是教育者自身经历或环境的翻版。按照胡塞尔的说法,意识的基本特征是其意向性,所有意识必须都是自觉的意识。一个客体成为意识的对象的方式是与意识将其自身导向该客体的途径紧密相连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注意力集中的过程,客体的某些方面才得以明确地再现。而注意力集中的过程,是和每个个体体验世界的方式紧密相连的。^[8]人们的实践,包括教育实践也如此。这些视而不见的非干预性教育活动,反射出教育者对生活特定的敏感之处与意图,也正是这些制约着人们在特定场景下进行有意识的教育干预,如有这样的记录:

我(本段田野观察的记录者)注意到红霞没有演算纸,所以做数学题的时候会慢慢地想,轻轻地,在题目下面用很小的字做运算。我随口说:“红霞,你这样算多累啊,还是在草稿纸上好好算吧”。说完我发现她没有演算纸,环顾整个房间也不大可能有,这时她从那旁的洗衣机上拿下一本摊开的杂志,在这个唯一的物理性质上为“纸”的东西上开始演算。这是一本杂志,具体地说,是街头散发的、宣传健康知识的、给某些妇科男科医院做广告的杂志。在红霞做演算的那一页,有两篇文章(如果能叫文章),分别叫“造成男人性冲动的几种姿势”和“爱情如洋葱:总有一片让你泪流满面”,附带半裸美女图。红霞就在这本印满了铅字的杂志上做演算,她需要离杂志很近,才能看清自己写的数字。

6点整,红霞写完作业,我陪着她收拾书包。看到她有一本《小学课文全解》一类的教参,问她“这是学校统一买的,还是你自己买的?”她说:“拣的”,没有任何语气或者情绪上的变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慢慢了解到,她家里有各种各样拣来的东西,大到家具电器,小到弟弟正在玩耍的泡沫做的老鼠玩具。

(红霞,女,四年级,ZH小学,随迁子女)

这幅家庭作业场景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干预性教育行为。红霞的爸爸从事废品回收行业,妈妈在家料理家务。家里很多东西都是回收的物品,包括孩子的演算纸。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写着“造成男人性冲动的几种姿势”的演算纸会给孩子身心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只是任这样的生活常态作为一种惯习和方式,保持在家庭里,成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如有这样的记录:

吃饭的时候,红霞弟弟把自己吃了一口但是不喜欢吃的菜又扔回菜盘子里,红霞妈妈和其他人对此没有任何表示。过了一会儿,红霞弟弟突然“呸呸”往饭桌上啐东西,唾沫直落餐盘。红霞妈妈解释说:“他吃着姜了”,继而用方言跟他说:“给我”,然后把红霞弟弟嚼过的姜接了过去。

(红霞弟弟,5岁;红霞妈妈,文盲,全职在家)

对餐桌礼仪的培养更直接地反映了在非干预性教育活动中,文化资本传递的过程。文化资本作为一类生活、行为、举止的品位和气质,成为人们获得阶级认同,并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形成互构的手段。红霞妈妈及其家庭成员对把已经吃过的菜放回盘子的行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正是在这种非干预性教育实践中,特定的餐桌礼仪在家长的非干预性教育实践中,继续维持下去,从而实现文化资本的传递。

在“不视而在”的非干预性教育行为中,孩子作为家校沟通的媒介发挥着主体作用,从而遮蔽了需要家长对于学校要求给予有主动性、有选择性回应的机会,使家长处于非干预状态。它凸显了孩子作为教育活动参与者,在家校互动中的主体性和主动建构的过程,如有这样的记录:

S老师在放学前跟全班孩子说,明天一定要带50元暖气费和20元寒假作业费用。红霞对这件事情是这样反应的:以前寒假作业都是15块钱,今年就涨了。马上就要放假了,还要交那么多暖气费,我才不交呢。

一路上红霞没有和妈妈说这事,我(本段田野观察的记录者)想看看红霞妈妈怎么应对,所以通过提示红霞的方式把这件事摊开来了。

红霞妈妈:红霞,交什么费?

红霞:暖气的,还有假期作业的,我不交。

红霞妈妈:交多少啊?你不交你老师不说啊?

红霞:她说我,我也不交,都要放假了,就这几天了还交什么暖气费。

红霞妈妈:那要是就你不交,你老师说你咋办?

红霞:她要老催我再交。

(红霞,女,四年级,农民工子弟,ZH小学;红霞妈妈,文盲,全职在家)

红霞懂得家庭经济状况紧张,全家只靠爸爸回收废品赚钱,她和妹妹上学,每个学期一共需要交学费1200元(民办农民工小学),弟弟上幼儿园,每个月交200元,家里房租每个月300元,这50元对于家里的开支算是不小的费用。如果我们没有提示,四年级的红霞已经在自己的心里盘算好了,根本就没打算和妈妈要这个钱,家长也就无从回应学校的要求。

孩子在其中的周旋看似遮蔽了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联络,有可能带来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失语或不响应。但宽泛地讲,它也是一份教育和成长的训练,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具有创造性、高度独立性和具有掌握自己命运感觉的人^[9]。突出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性,也是基于对人性本质上的生物性、劳动性、历史性、开放性、完整性以及主体性的遵循。

3. 限定与模仿——情境性教育行为

情境性教育行为是基于教育的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阶级性、实践性、生产性、创造性、选择性等诸多属性,在不同情境下,教育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进行的干预行为,从而形成对孩子的影响、建构出种种家校互动模式。这类教育活动强调对特定情境的依赖,比如物质基础、个人经历、教育理念等对具体教育行为的影响。因此,在限定与模仿中,情境性教育行为更能敏感地折射出社会文化要素对教育活动的制约。

(1) 物质的根基

家校互动是以家庭和学校的存在状况为前提的,如果其中一方的物质基础处在动荡之中,那么双方的互动将受到直接影响。响亮的爸爸在2009年被诊断出直肠癌。他把自己的病因归结于从事废品回收这个职业中的污染所致。尽管做过手术,但是医生对响亮爸爸病情判断非常不乐观。响亮的妈妈听力很差,也在废品回收行业从事体力劳动,挣得微薄的收入。响亮的哥哥曾经

在ZH学校读初中,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还担任班长,自从爸爸生病后,哥哥不得不辍学,加入到废品回收行列中,凭着年轻力壮,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如有这样的记录:

晚饭后响亮说英语老师让他参加补课,因为他英语比较差。响亮哥哥出去收废品七点多才回来,得知响亮老师要求他补课连连摇头,说补课没什么用,表示反对。爸爸问响亮是补课,还是用补课的200元钱做其他的事情,比如给他买其他的东西,响亮坚定地说要补课。爸爸说,响亮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了大学把钱还给你哥哥。2010年11月25日,我们(指研究小组成员)第六次进入响亮家的时候,知道响亮最终没有参加补习班。而且响亮告诉我,爸妈和哥哥都回河南老家了,因为“医生说我爸活不长了”。他现在住在大姨家,到12月份,我们从响亮大姨那里得知,响亮也回了老家。

(响亮,男,四年级,ZH学校,随迁子女)

在是否参加补习班和回家环节,响亮家的决定和爸爸的病情以及家里的经济收入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家庭因病致贫,哥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对于是否报补习班有着很大的发言权。老师那边建议响亮上补习班。在这个问题上,家庭决策从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对补习班效率的评估出发,没有采纳老师的建议。响亮的班主任老师说,“响亮这孩子已经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无忧无虑了。我对他不说重话,其他同学也挺懂事的,不跟他随便开玩笑。”她曾发动全班师生捐献70元钱,帮响亮买了一套校服。统一着校服,是学校教育自觉性、目的性、集体性的一种表现。^[10]尽管如此,学校在实施统一教育行动时,通过老师对学生及其家庭的了解,积极想出弥合家庭与学校之间需求与状况矛盾的办法,这让学生体察人性的善良,是家庭和学校互动中一次正面教育。但响亮家因病致贫,全家处在流动和迁移中,直接显示了家校互动所依存的物质根基的基础性和脆弱性。

(2)模仿的力量

德国教育人类学者武尔夫在《教育人类学》中,通篇阐释了模仿对于教育的意义。他说教育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模仿的过程。这里的模仿不是效仿,也不是模拟,而是在润色和发展中,将创造和形变统一起来,形成建构化的模仿。^[11]教育

者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对自我人生经历和人生图景的模仿,更体现了教育活动的对具有鲜明个性的情景的依赖,如有这样的记录:

谈到对小阳未来的设想,小阳妈妈说“肯定得上大学啊,现在这个社会吧,到时候再根据她的专业定吧。包括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都是自己找工作的。就像安利里面,好多都是大学生,他们也都是找不到工作才来的。(在安利)也不是说不算工作。一听是安利的,都躲着点儿,不像现在……安利也有大学,全国各地都有,就是培养全方面的(人),包括接触人啊接触社会啊,要符合一定级别的(安利工作人员)就可以上,我也没上过,我还没到那个级别,也不清楚,也是听说的啊……如果小阳以后也做安利,就有了“共同语言”。

(小阳,女,四年级,流动人口家庭,SB小学;小阳妈妈,35岁,初中毕业,安利销售员)

小阳的妈妈、小姑、爸爸都在安利行列里。他们对小阳未来职业、学历的规划以及家庭经营模式,都在描摹着安利模式。很多次看到小阳妈妈或爸爸督促她完成作业,可以将它理解为家长正在按照安利展示的图景塑造孩子。然而,小阳每天在爸爸经营的照相馆里间写作业、玩耍,妈妈经常带着人在照相馆外间进行宣讲,安利营销工作又在影响着她的教育环境。

(3)期待与信心

对教育目标的期待是推动人们进行各种教育实践的重要动力。尽管教育期待并不完全体现在学业期待上,但是,从家长对孩子的学业期待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家长对于家庭教育活动的自觉程度。在WJ有60%的家长认为,孩子未来学历至少要达到大学毕业,而这一比例在ZH为45.2%,虽然略低,但是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差距那样明显。然而,问卷直接反映出,两校学生家庭不仅物质条件差异明显,而且ZH学校家长和老师互动的频率和明显少于WJ学校。在WJ学校87%学生有自己的房间,在ZH只有7%的学生有;在联系方式上,ZH学校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约占60%,21.9%的家长没上过学或小学没毕业,使用短信、家长会、试卷签字等方式的比例均在10%以下;而在WJ学校,短信、家长会则是最常见的联系方式,分别占到73%和50%,电子邮件或博客的方式也占一定比例。从家校互动的频率上看,

WJ学校20%的学生家长本学期没有和老师联系过,而这一比例,在ZH学校则高达52.6%。特别是在“家校合作不理想的原因”反馈中,虽然两校家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大比例都是集中在“家长太忙”上,但是WJ学校家长这一选择比例为24%,而ZH学校的为50%。在第二位的原因的归结上,WJ学校家长选项依次集中在“老师没有更多精力”、“缺少更多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在这方面下工夫”;而ZH学校将第二位的原因较为集中地归结为“家长文化素质不足以指导孩子”。很多家长因为自己是文盲,在学校和教师的文化强势面前有压力,选择了逃避和不接触的策略。这一点,在访谈中也得到印证,红霞妈妈是个文盲,从不去开家长会,说“要是文化,开家长会我准去”。可以看出,学校作为专业的文化传播机构,在很多贫困文化的家庭文化面前具有强势,在二者的接洽中,不具文化资本优势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通常处在被动和不自信位置,从而形成贫困文化再传递的可能。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我们基于对WJ、ZH、SB三所学校的小学生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动观察,以及对家长、老师的问卷调查,对家校互动的模式、实践进行描述和梳理,可以将其分为干预性教育行为、非干预性教育行为和情境性干预行为。这三种类型的家庭教育实践相互交叉,基本上包括了家长、儿童和老师的日常教育实践。

从田野观察素材来看,干预性家庭教育行为的教育诉求与学校教育要求显示出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也体现了家庭的教养功能和学校的教育功能共同为塑造未来的社会成员发挥作用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尽管目前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有限,但他们对子女教育有着强烈的期待,以看似简单的方式,延续着学校教育以及社会主流价值在为人处世、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要求,显现出家庭教育的意识与动力。由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一致性,基于它们共处于现世下,共同将教育对象塑造成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

在非干预性家庭教育行为中,之所以不干预,或者是与家长对于某项干预的必要性缺乏认知有

关,或者是由于孩子作为教育主体,活跃在家校互动环节中,按照自己的安排,遮蔽了家校信息沟通的渠道和干预的可能。与相对狭义的有意识的干预教育行为相比,家庭教育活动通常杂糅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使家长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实施者对家庭生活的物理环境、物质条件、日常礼仪、家长成长经历等因过于熟悉的实践惯习而容易缺乏理性的自觉。对于研究者而言,正是将家长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教育干预行为剥离,关注其发生的真实场景,挖掘其背后所隐含的思维结构与社会文化动力,才可以对家庭教育活动给予更冷静的审视。按照教育人类学的理解,教育是文化模仿和濡染的过程。在本研究涉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活动中可以看到,父母所携带的植根于农村的文化惯习,会在非干预教育行为中,以规范缺失的方式,呈现给子女文化模仿的对象,从而实现惯习的代际传递。尽管城市文明通常是在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在孕育出的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方式基础上构建的文明体系,但在文化相对论原则下,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并无优劣之分,它们分别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与运行逻辑。但当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时,他们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空间的位移,而是农村文明适应城市文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所具备的特定的文化惯习、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甚至是文化自信心,在家庭教育环节得到潜移默化的复制与传递。

在家庭教育活动的感性与亲情与学校教育的理性与规范的对接中,势必在动态中呈现参差与抵牾。这源自家庭场域下的感性实践和学校作为次级社会群体下的理性实践之间的张力。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同时意味着凭借有限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在城市谋求生存的同时,将随迁子女植入城市文化的压力与需要也日渐呈现。在这一延绵不断的动态中,作为教育对象的主体性的孩子,则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得到悄然的生长。恰恰是在这种无声的成长中,孩子们对实践的感知不断强化,从而实现着社会化的点滴进程。

以往以多元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为代表的英美教育人类学,往往强调族群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存在差异,从而引起学生在文化上的不适应,带来学业失败。而在中国,在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在人口流动日渐出现家庭化的背景下,如何激发和帮助农民工意识到家庭教育意义,识别自身家庭教育中的积极因素,克服掣肘因素,促进其教育子女更好地适应城市文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

参考文献:

- [1] 段成荣,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 人口研究,2008,(11).
- [2] 埃德蒙. 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2
- [3]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8-116.

- [4] 叶澜. 教育概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10.
- [5]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69.
- [6] 布迪厄.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0.
- [7] 缪建东. 家庭教育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22.
- [8] 李鹏程. 胡塞尔传[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03.
- [9] 庄孔韶. 教育人类学[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154.
- [10] 李剑萍,巍薇. 教育学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9.
- [11] 武尔夫. 教育人类学[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Pilot Exploration on the Interactive Cultural Mechanism Between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Migrants Children Families'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Beijing

Liu Qian, Feng Yue & Shenglong Quzhen

Abstract: By virtu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together with the field work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b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practical models as the intervention education practice, non-intervention practice and contextual practic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in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 In each type of interaction, there has bee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ltural factors on education practice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 the limit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one's self experience. With relative poor material and social capital, both the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culture

Authors: Liu Qi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of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pul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Feng Yu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Shenglong Quzhen, doctoral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of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pul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责任编辑:许建争]